

5-06

文史資料選輯

第二輯

山東省臨朐縣委員會編

编辑凡例

一、本选辑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资料，并推动撰写资料工作的开展。所选的资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选辑只在内部赠阅，以供参考。

二、本选辑所选的资料，包括从清代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个方面，不拘体裁，只要有历史价值，均可选入。

三、本选辑所刊印的资料欢迎提出补充和订正。同时，也希望给我们帮助和指导。

目 录

临朐县赵家楼村党支部初建情况·····	高启云 (1)
中共临朐县委早期组织、活动情况述略·····	马昭先 (7)
我在弥东区委工作时的回忆·····	张文明 (13)
沂山斗争纪实·····	李奎德 (20)
在向明同志追悼会上致的悼词·····	(50)
临朐战役片断·····	赵树榛 (54)
回忆十支队的创建与结束·····	王凤五 (57)
临朐县解放后教育发展情况回顾·····	马俊之 (61)
我所知道的三青团山东支团部·····	李好信 (68) 省採用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苏鲁战区游击第三纵队 电台和国民党山东省府电台的一些情况·····	贾洪梁 (74) 省採用
解放前我任临朐、益都两县国民党职务的若 干情况·····	吴芳亭 (78) 省採用
耶稣教传入临朐亲历记·····	瞿理 (108)
忆语随笔·····	瞿理 (116)
一次反抗军阀准备接应北伐军的起义事件 ·····	冀蔚怀等 (120)
风波龙岩寺·····	王继龄 (124)
临朐县“国大”代表选举见闻·····	李同仁 (127) 省採用
方山土匪王二麻子罪行一、二·····	谭金亭等 (129)
韩复榘扶二、三事·····	康汉民 (135) 省採用
周钧英草菅人命几例·····	马福吉 (139)

《庄农日用杂字》	马益著 (142)
一种《杂字》	吴伯簪 (153)
庄户书——《庄农日用杂字》	马维堂、曹筱筏 (159)
临朐周姑戏简介	赵光宝 (165)
沂 山	宋德昌 (168)
青定回 石 门 山	谭家昌 (172)
铸剑池及其他	曹筱筏 (177)
青手回 老龙湾碑竹	冯益汉 (181)

临朐县赵家楼村党支部初建情况

高 启 云

一、在三十年代上半期，赵家楼村住民一百余户，人口在千人左右，土地七百二十亩（七百二的杆）。有三家经营地主，最大的一家吴宝璜，有地八十亩（合市亩二百四十亩），雇四个长工，农忙时雇大量短工，也是临朐县有数的大地主之一。有三家富农。有不到二十户中农，他们勤劳劳动，省吃俭用，一般能勉强过活，少数逐渐下降为贫农。大多数是贫农，有一点土地，靠出卖劳力，做短工、作木工、搞运输（推小车）和经营小商贩，生活比较苦，指地没有的只有一户。当时，除富农地主外，整个村庄（包括中农），在经济生活上，拚命挣扎，处于想找出路又没有出路的状态。

政治上，个别富农有恶霸行为，一般地主富农对贫下中农，除劳力上的剥削外，另外对群众作威作福、欺压敲诈的事很少。村政权掌握在中农手中，当然他们代表的是中农以上的利益，有些事得先征得地主、富农的同意，否则，就不能办。另外，有的事不应按户按地亩平均摊派的也摊派了，让贫农与地主富农平均负担。村政权形式上掌握在中农手里，实质上仍然是维护地主、富农利益的。

在思想文化上，整个村子不论贫富都被封建思想紧紧地统治着。记得我七、八岁时，全村活着的秀才还有五、六人，全村高、郭、吴、张、赵五姓，都有本姓书法比较出色

的人物。民国以来仅有县师范毕业生、高小毕业生七、八个人。整个是文化落后，而封建文化同样掌握在地主、富农和少数中农手里，多数贫农基本上没有文化，是文盲或粗略识几个字。他们听听瞎子说：“刘大人私访”、“王公子赶考”或者看看旧戏就算最大的文化享受，更听不到什么新文化新思想。

二、党支部建立的经过

1、一九三五年到三六年七月以前，开始宣传社会主义革命与抗日救亡思想。我与孙蔚兰（孙家小崔人）一九三四年考入济南乡村师范，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觉得不仅孔孟一套不行，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不行，中国劳苦大众的出路，只有走共产主义的道路。与孙蔚兰觉得象茅塞顿开，找到了真理，要革命的情绪很高，决心要为这个真理而奋斗。如饥似渴的阅读革命理论书刊，把课本置之度外，暑假期间，向接近的群众，尤其是向家庭的兄弟姊妹们开始进行一些宣传。其中接受最快最认真的是叔弟高启节（后改名高奋），他抽空就找我问这问那，当时谈的主要是：穷、富是不是命定的？为什么穷人一辈一辈，流血流汗，当牛当马，到头来还是忍饥受饿？穷人的根本出路在哪里？只有团结起来，打倒地主阶级，实行共产主义。讲社会为什么会变化？朝代为什么会兴代？不是“皇帝没福民遇难”，也不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五百年必有一王者兴”的天命论，也不是少数圣贤豪杰随意决定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上层生产关系的变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等等。高奋对这些道理也如饥似渴的需要，有时谈到深夜，有时一早就趴在我床头上讲起来。

以后介绍一些书刊，他非常认真阅读，他理解领会的很快、很深，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他的思想中逐渐的树立起来，并积极的向他接近的青年群众进行宣传。我当时自认为思想上信仰共产主义自然就是共产党员，高奋当时思想上也同样认为他自然是共产党了！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又得寸进尺的侵占华北，企图灭亡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假期在这方面更广泛的做了一些宣传工作。特别“一·二九”平津学生发起伟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之后，济南的学生便积极响应。当时的省主席韩复榘强迫各校提前放假，把学生押送回乡。我和孙蔚兰同学便在家乡一带进一步作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宣传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华北危机、亡国危机，揭露国民党蒋介石“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它不但不抗日，还反对、镇压人民抗日。高奋和他们影响下的青年群众都表现情绪激昂，痛恨国民党，要坚决抗日。

2、党支部的建立

一九三六年春节后入校，我与孙蔚兰同时被党组织接受，加入中国共产党。到暑假回家后，便与高奋谈，只有共产主义思想还不是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是个非常严密的革命组织，只有经人介绍和党组织批准接受，才算正式共产党员。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革命胜利。他表示要加入，但不知哪里有共产党的组织，找谁介绍。我表示我已经是正式共产党员，可以介绍他，并告诉他党员要作些什么、怎样活动、党的秘密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党的事绝对不能向任何人讲，绝不能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在困难的时候要牺牲个人，也不能危害党组织。他表示坚决接受。便吸收他为

正式党员，我俩人编成临时党小组。接着高奋介绍已培养成熟的高德福、高景和，经我个别谈话后，批准接受他们入党（当时没有后补期）。这样便由高奋（高启节）、高德福、高景和三位党员成立了共产党赵家楼支部，高奋任支部书记。时间是一九三六年七月，在差不多的时间内孙家小崔经孙蔚兰同志工作，党支部也建立了，由孙芳兰任支部书记（两个支部不发生联系）。高德福当时二十一、二岁，贫农，聪明机警，以后高奋离村他一直潜伏在村内任支部书记直到解放，做过不少工作。高景和三十岁左右，贫农，忠厚朴实，大胆泼辣，有社会活动能力，能担当艰难危险的工作，参军后作供给工作。

3、党支部建立后进入有领导的开展工作

首先团结教育青年。高奋自己住一个闲院内，便成为联系群众的中心和俱乐部。从讲故事到学识字、学珠算、读书看报。除我看过的书、报、刊物寄给他们外，他们自己也弄点钱订了点报纸、刊物，如：大众生活、文化报、世界知识、中国农村、大众哲学，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和一些社会科学书籍、小说等。家长们看到自己的孩子到高奋那里是学习、长出息，不赌博。同时都认为高奋是个好孩子，他劳动，有老有少，没有坏毛病，都愿意孩子与高奋接近，这样党支部便团结教育了一批青年农民（成为抗战初期拉队伍的基础）。

其次，开始与地主作斗争。他们组织少数青年杀地主的树，搞地主的庄稼，一部分用来买书报，大部分用来救济生活特别困难的党员和群众，这事情他们做得非常严密，一直没有被人发觉。

三是经过教育、考验选拔、培养对象，继续发展党员，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又发展了郭佃栋、高启冉、郭元久、王健（女）等，都是青年贫农，整个支部已有近十名党员。另外我临离家时发展的大辛庄子陈福太同志，交予高奋单独联系。当时赵家楼党支部与上级党的关系，是经过我与济南乡师支部联系。假期回校都汇报赵家楼党支部的活动情况。一九三七年六月底，原乡师支部书记景晓村同志以省委（或工委）巡视员的名义到赵家楼检查过党支部的工作，参加过党小组了解党员的活动情况。

三、抗日战争爆发后，赵家楼党支部的一些活动情况

景晓村同志从临朐回济南后，“七·七”事变爆发了。接到景晓村同志的信，要我马上回济南，从此与赵家楼党支部的工作便没有联系了。以后去济宁，一九三八年一月去郛城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又被组织分配到临朐独立团工作。这时县委已成立。我在独立团只有四个月。临朐环境恶化，大部时间住在沂水悦庄，这时听高奋、高景和等同志谈，

“七·七”事变后，赵家楼支部的一些活动，记不很清，只能作参考，主要的有：事变后党支部怎么办？他们急于与上级党取得联系。到益都找陈锡德（我乡师同班同学，党员），到河东找窦长祥（曾见过高奋谈过话），都没有取得正式联系。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他们谈日本占济南、占胶济路后，便发动群众抢了五井盐店。不仅赵家楼，连周围村的群众也参加了，这一下他们的工作展开了。积极发动群众搞武装，与益都陈锡德同志一起发动组织十支队，以后合并于八支队，郭佃栋同志留在八支队，以后牺牲在渤海区。扩大党的组织，赵家楼党支部扩大了，同时在附近村庄的孟家

庄子、小石庄、朱阳等村发展了党员，有的建立了支部，这些是听说的，详细情况与以后工作我不清楚。

赵家楼党支部在地下和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一直是坚持斗争，坚持阵地做了大量工作。是经受过严重考验和锻炼的，对临朐县工作的开展，是有着一定影响和贡献的。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中共临朐县委 早期组织、活动情况述略

马 昭 先

回顾临朐党组织的革命斗争史，应从济南乡师党的活动谈起。一九三五年我到济南乡师读书，由同乡同学窦长祥（于杰）、高启方（高启云）、孙蔚兰（孙毅民）等同志介绍，看了一些哲学、社会科学等进步书刊，接受了进步思想，向往共产主义。这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东北四省，又向我华北入侵。国民党反动政府抱着不抵抗主义，步步退让，一九三五年六月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进一步出卖国家主权的“何梅协定”，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等伪组织，整个华北笼罩在“亡国无日”的恐怖气氛之中。在这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国民党政府不但不组织军民团结抗日，反而提出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口号，发动内战。举国上下，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卖国政策义愤填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议“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消息迅速传开，全国各大城市学生立即行动起来，纷纷举行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这时，济南城怒吼了！乡师校园怒吼了！这就是划时代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当时，我经窦长祥介绍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投入“一二·九”学校罢课运动。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对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十分害怕，派出军警

镇压，勒令我校提前放假，解散学生组织，用火车强送我们回家。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我们回到原籍临朐后，在赵家楼、孙家小崔、黑洼等村，由高启方、孙蔚兰、窦长祥等同志领导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吸收积极分子高启节（高奋）、孙海兰、孙青兰、孙安昌等人入党，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临朐农村。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很快犯抵济南，学校被迫南迁。这时同乡同学张建禄、康富之、刘学修、马云洪等离校回家。我受窦长祥同志的邀约，随校南迁，打算到延安抗大学习。我们行至鲁西南巨野县，接到党的指示，去延安路上国民党关卡很严，要我们放弃去抗大学习的计划，回原籍组织抗日武装。据此，窦长祥同志带领我们返回临朐，途经济宁，果然遇到国民党的关卡，他们以升官发财为诱饵，贴出黄埔军官学校招收新生的简章，欺骗青年入伍。同学刘玉溪、李美训二人被诱入黄埔军校。窦长祥、王宇坤和我三人不受他们的阻留，毅然返回临朐。我们回到家后，窦长祥同志提出两项任务：一是串联早期回家的同学，做到不放弃一个人，争取他们到革命阵营里来；二是向上接通党的关系，争取党的领导和支持。我们分了工，当即行动，分别串连李逸民（李本修）、崔金坡、张建禄、康富之、冯少伯等，并向他们传达了组织抗日武装的任务和要求，他们积极响应。这时，国民党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以致马云洪、刘学修、王法慧、王子孝、付绍冉等没争取过来。薛僧林是中间分子，经过一番工作，才争取过来。

为了和党接通关系，一九三八年春窦长祥约我去沂水县北石碛村找到他的同班同学党员邱野民，但此行没有与党

接上关系。同年秋天，听说同学姚仲明、廖容标在博山成立了八路军四支队，窦长祥和我又约了李逸民、马云祉、高启节去博山太河找到了四支队政委姚仲明、司令员廖容标。姚答复说：“部队党不与地方党接关系。”他应允与地委联系后，再和我们联系。一九三八年春，八路军八支队来临胸，我们找到马保三司令员请求他支持我们组织抗日武装。马司令员慨然应允，给我们“临胸县独立团”的名义。在八支队的积极协助下，我们缴了伪桥头乡公所几十支步枪。这时，李逸民、崔金坡、张建禄移驻三岔店。我经窦长祥同志介绍，履行了入党手续，在独立团作宣传工作。当时的任务是：做好巩固现有部队的工作，同时积极扩军。蒋峪区土匪张汉芬、李老五带领二十多人前来参加。我们认为这些人极不可靠，参军是假，目的是拐骗枪支，但当时不好拒绝他们。结果，不出所料，李老五带来的人挑选了八、九支好步枪，于当日傍晚携枪逃走了。由于我们缺乏经验，面对这损失颇大的事故，束手无策。就在这时，二地委书记金明同志和组织部长杨纯同志自博山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向他汇报了工作情况和发生的问题。金明书记听了汇报后指示我们要下掉土匪张汉芬的枪，以防后患。为了加强党的领导，把窦长祥、李逸民、崔金坡和我从独立团调出来，组成“临胸县工作团”（即县委），窦长祥为书记，李逸民为组织部长，崔金坡为宣传部长，我任工作团秘书。为了收缴张汉芬的枪，鉴于窦长祥同志缺乏领导部队经验，地委报请省委调高启方同志前来领导和指挥行动。这时临胸县工作团驻在沂水县悦庄，张汉芬也随同驻在这个村里。根据组织上的安排，张建禄同志作内线工作，与张汉芬同炕共眠，高启节率领战士高

景和、李彤云等收缴张汉芬一伙的枪支。行动开始，张汉芬从炕上爬起来反抗，被高启节同志当场击毙，其余的人慑于我们的威力，未敢反抗，我们把这一伙人的枪全部缴来了，一切进行得很顺利。事后，我到八支队供给部领来遣散费，由高启方对被下掉枪的人员讲了党的政策，并发给每人路费遣散回家。临朐县独立团经此整顿，比前巩固了。高启节、张建禄率领全团人员由沂水悦庄开来临朐坡邱村驻防，编入八路军八支队，由八支队领导。临朐县工作团仍住原地未动，对临朐县地下党的领导靠通讯人员联络。由于当时环境极为恶劣，工作不易开展。

根据省委指示，调冀长祥同志到省党校学习，调高启方同志任新泰县委书记，临朐县工作团书记由郝心昌同志继任。一九三九年六月日寇大扫荡，地委带领我们向南转移，行至燕子崖附近，得知日寇已占领了该村，山头四处打枪阻住我们的去路。日暮，地委民运部魏部长命令我们疏散回家，不要跟随地委转移。郝心昌同志因是江苏人，留在地委另行分配工作，工作团书记由李逸民兼任。一九三九年八、九月间，李逸民同志带领我和崔金坡、郭洪林（青年部长）各自回家转入地下工作。我在李逸民同志指示下，以在木村当小学教员作掩护，担任弥西区委书记，组织委员为高德福，宣传委员为高辉，在郭洪林家开过几次会，研究开展工作问题。我因作党的工作经常外出，耽误教学，引起了有些人的注意。有一次在郭洪林家开会，天下大雨，我返回学校时，见教室里水深及膝，学生离开了教室躲到地主的羊圈里。为此事我遭到地主的诽谤和监视，并扬言我有马牌手枪，经常外出开会，一定是共产党，报告了驻在郝家庄的伪

区公所。伪区长杨延吉带着伪军到我家搜抄，吓得我父亲精神失常，不能控制自己，不久上榆树砍榆叶跌死。这时我的处境更难了，但没有接到党的指示，不能转移，工作很难开展。一九四〇年初地委组织干事李铎同志来检查工作后，是年二月调我到临朐县委任宣传部长。县委书记是崔杰千同志，李逸民任组织部长，原宣传部长崔金坡同志调省党校学习，我接替他的工作。县委在朱家坡办过一次党员训练班，在茹家庄办过小学教员训练班。在训练班上，针对“太河事件”国民党制造摩擦的严重局势，宣传党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的方针政策，取得了一定成绩，党的组织有了新的发展，如教员陈冠三、傅松亭在这时经我介绍了入党。

为了执行团结抗战的方针，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我八支队在嵩山东麓国家峪村歼灭了国民党八支队杨西九部张子中营，人民拍手称快。一九四〇年五月马保三司令员带领八支队离开我县，临朐县委由崔杰千书记领导，随军转移到沂南岱庄，找到二地委。地委书记王子文同志批评我们不应该离开临朐，命令我们返回原地坚持工作。这时省委召开宣传部长会议，我到省委驻地临沂县青驼寺开会半个月后回到地委，知临朐县委已经走了。王子文书记叫我随刘莱夫去找临朐县委。到了莱芜响水湾找上了李逸民同志，他对我说：“崔杰千书记因不是临朐人，被留在地委工作，高启节同志是八支队团政治处主任，为了开展临朐工作，地委调回高启节同志任临朐县武装部长兼县大队长。”同时返回的还有冯少伯、李仲恭、谭志奋、郭奎三、马琴湘、高仁诚等。李逸民同志是县委书记兼组织部长。我在途中传达了

省委宣传工作会议精神。这时临朐县委派人与益都县长冯毅之同志取得联系，开往益都，在长邱驻下后，冯毅之同志除向我们介绍了坚持敌后斗争的经验外，还向我们建议：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可疏散非战斗人员。”但这时敌人已三面包围了长邱，西临淄河，水位陡涨难渡，情况十分险恶。在冯毅之县长协助下，我们夜里对敌进行反击，才争得了时间渡过淄河。在渡河时冲走了组织干事高仁诚同志和李凤华同志（当时他生病），被激流冲下数里，发现后已抢救不过来了，我们就地掩埋了两位同志的遗体，继续行进至淄川县葫芦台村。临朐县委决定在这里疏散非战斗人员。李逸民书记指示我带着吴启津、马琴湘利用地下关系，回家隐蔽。我说：“一九三九年我在家搞地下工作已被敌人发觉，遭到伪军抄家，现在我不能回家去，跟你一块战斗。”李逸民书记最后决定还是让我回原籍利用社会关系到内兄张鹤轩所在的国民党区公所隐蔽。我执行县委决定陪同吴启津、马琴湘由地下关系护送到湖田镇，由湖田站上火车，到益都下车后，马琴湘个人回了家，我和吴启津在夜间返回家中。遵照李逸民书记的指示，我和吴启津利用社会关系隐蔽下来。

从此以后，我离开县委到别的单位工作去了。

我在弥东区委工作时的回忆

张 文 明

中共弥东区委是根据二地委的指示在一九三八年初建立的。组织情况是：区委书记张兴忱（战家庄人），组织委员张曰瑾（战家庄人），宣传委员王香山（又名王德兰，福山村人）。当时区委以战家庄和桃花村为活动中心，并在战家庄开一小铺作为党的联络点，在小铺主持“买卖”的是张光明（党员，战家庄人）。区委配有两个交通员，一个是姚家庄的贺元勇，一个是张陆河的张兆勇。当时区委的中心任务是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区委负责人除积极进行个别培养教育外，根据上级指示，还选送了一批积极分子参加了当时八路军八支队政治处在五井镇附近的朱家坡村举办的党员训练班。

张瑞瑶、张兴训和我，在区委负责同志的培养教育下，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在我家后园的一个闲屋里一起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区委组织委员张曰瑾还向我们进行有关党的知识的教育并解说了统一战线联合抗日问题，还讲了党的秘密活动和严守机密的重要性。过了几天，张曰瑾来到桃花村把我们三人叫在一起对我们说：“你们已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今天起就是中共党员了。”在他的主持下，接着建立了桃花支部，由我任支部书记，张瑞瑶任组织委员，张兴训任宣传委员。并布置了支部的任务：要秘密发展党员，扩大党的组织。